

东亚主要经济体收入分配的比较研究

沈红芳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本文首先介绍了当前流行的收入分配理论及其衡量方法, 比较研究了东亚各类经济体的收入分配情况。在加深对东亚经济发展多样性认识的同时, 论证库兹涅茨的有关收入分配“倒 U 型曲线”的理论是不完全符合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实际情况。

关键词: 东亚发展中经济体; 收入分配; 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F1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 (2004) 03-0016-09

东亚地区相对均衡的收入分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还是经济发展的条件, 一直是国际经济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 相对均衡的收入分配是东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提条件。经济发展初期, 东亚经济体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 经济增长成果得到了较为公平的分享, 从而使得东亚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目标较得到人民大众的支持, 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有学者认为, 东亚地区相对均衡的收入分配是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 而政府在收入分配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是东亚收入的分配偏离库兹涅茨倒 U 曲线假设的主要原因。

笔者认为, 有关争论都是以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 因而并不符合东亚各类经济体的实际情况。从比较研究的角度, 本文采用了衡量收入分配的一般方法, 对东亚主要经济体的收入分配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同时, 分析了收入分配与经济政策、经济发展性质, 以及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 收入分配与教育的关系, 以及收入分配与贫困之间的联系, 以加深对该地区经济增长与发展多样性的认识。

收稿日期: 2004 - 06 - 13 日

作者简介: 沈红芳, 女, 上海人,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南洋研究院教授, 厦门大学金融系兼职教授。

* 本文所涉及的东亚 8 个经济体为亚洲“四小”(新加坡、韩国、香港与台湾)和东盟四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

一、收入分配理论及其衡量方法

在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时，三种不同的理论具有较大的影响。一种理论是西蒙·库兹涅茨（S.Kuznetz）的“倒 U 型曲线”理论，一种是“滴流效应”理论，还有一种理论是赖特（C.L.Wright）的制度假设理论。

1955 年，库兹涅茨提出了不平等度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倒 U 曲线关系的假设。他认为，一国经济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过渡期中，收入分配不公平在发展初期阶段会恶化。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较高水平之后，收入分配便会变得相对均衡。如果以占人口 40% 的低阶层的收入比重来衡量收入分配时，这一比重将会随着经济过程的继续而下降，达致一个最低的点。如果用基尼系数对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中的收入分配进行测量时，基尼系数的变化表现为一条“倒 U 型曲线”。之后，当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之后，分配的不公平又将会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主要取决于市场力量的作用，即劳动力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在工业部门就业的工人要比在农村的农民挣更多的工资，这就使得收入分配趋向于不公平，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之后，农村便出现劳动力短缺，这就使得农村使用机械化和现代投入物。农村的生产率和工资将会提高。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工业部门，会对工资产生影响，使得工资急剧下降。这些变化会使收入分配在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更为公平。[1]

受西方经济理论的影响，20 世纪 50、60 年代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社会存在一种“滴流效应”。虽然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贫富分化和不平等，但是，富有阶层的财富可借助于政府的调节实行重新分配，使经济增长的果实“滴流”给穷人。因此，增长就是发展。只要经济总量增长了，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就业、分配、社会福利和人民的生活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模型说明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收入分配不平等可以提高资本的投资率，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最终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得到改善。因为政府的财政实力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加强，可以通过再分配政策对社会收入分配进行干预。而且，经济增长过程本身也会逐渐形成使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机制。因此，先增长后分配，通过 GNP 的增长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民众的富裕是那个时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精髓。

制度假设理论则对库兹涅茨的倒 U 型曲线假设理论提出了可供替代的思路。赖特（C.L.Wright）认为，市场力量不是决定收入分配的唯一因素，决定收入分配状况的主要因素是机制和政府的政策。如果过度关注市场力量而忽视机制变迁和政府政策，便会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产生错误的认识。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象倒 U 曲线理论所假设的那么多变。事实上，没有任何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都必须经历如倒 U 曲线假设所描述的这种单一模式。此外，机制变迁和政府政策也有可能继续导致收入

早期发展经济学的代表性理论，如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纳客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动理论”，都极力强调增长第一的观点，为先增长后分配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不公的恶化，而且，这种情况不可能得到“自我纠正”。收入分配高度不公的国家尤为如此，因为控制政治和行政权力的精英是不会贯彻那些对其既得利益有所损害政策。制度假设理论还认为，教育和人口增长不是收入分配的结果，而是决定收入分配的因素。凡是一国的收入分配极端不均衡，其教育机会也将非常不均等，由于大部分人口接受落后的教育和低收入状况将导致大家庭的规模，因此人口增长率亦将趋于增高。制度假设理论认为，教育与人口增长非但不是影响收入不均等的变数，而是收入不均等的结果。[2]

国际上衡量收入分配不均等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规模分配，另一种是功能分配。

规模分配是经济学家最常用的方法，主要通过三个手段进行：(1) 高低收入比率；(2) 洛伦茨曲线；(3) 基尼系数。

使用高低收入比率的手段衡量收入分配情况时，通常把个人收入分为 5 个组别或 10 个组别从多到少进行排列，比较各个组别所获得收入的高低。将收入最低的 40% 人口所获的收入与收入最高的 20%，或 10% 人口所获的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率进行比较，以此衡量一个国家最穷和最富两个极端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洛伦茨曲线的使用则可以较为直观地反映出一个国家收入分配的情况。利用所采集到的数据，画出一条表明收入获得者的百分比与他们获得的收入的百分比之间关系的曲线。曲线离对角线（绝对平等）越远，表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越严重。在洛伦茨曲线的基础上，计算洛伦茨曲线和对角线之间所包围的面积与洛伦茨曲线所在的半个正方形的面积的比率，得出基尼系数。介于对角线与洛伦茨曲线之间的面积越大，则计算出的基尼系数便越高。从理论上而言，基尼系数可在 0（完全均等）与 1（完全不均等）之间。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两种状况不可能存在。一般介于 0.20 ~ 0.60 之间。收入分配比较平等，基尼系数则一般在 0.20 ~ 0.35 之间。[3]

二、亚洲“四小”的收入分配：库兹涅茨假设的例外

截至 80 年代中期，亚洲“四小”的收入分配发展情况未出现与库兹涅茨假设相一致的情况。除了韩国以外，其他经济体的收入分配在战后经济发展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尤其是在 60 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的 16 年间是得到改善的。在 1965 ~ 1966 年间，有关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新加坡和香港为 4.98 和 4.67，韩国和台湾分别为 3.44 和 3.58。到 1981 - 1982 年，新加坡、香港和台湾降至 4.43、4.53 和 3.08，韩国升至 3.57。[4]

很多经济学家，包括世界银行的资深专家都认为亚洲“四小”的收入分配情况在经济高速增长初期并未出现恶化，是库兹涅茨假设的例外。[5]这也使很多经济学家坚信，亚洲“四小”政府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追求面向出口增长的经济目标之所以能够得到公众的支持与合作，其重要原因是：经济增长成果较为公平的分享。[6]

不过，从 80 年代初期开始香港与新加坡经济增长过程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土地与劳

功能分配也称为要素收入分配。即每一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所获得的收入份额。根据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微观经济理论，要素的价格由该要素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共同作用决定。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总是根据各种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获得报酬。劳动者获得工资、地主获得租金、资本家获得利润。这种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因此，在这里不再具体介绍。

动力的短缺使得这两个经济体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香港主要是往中国大陆转移，新加坡则重点向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转移，主要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与此同时，新加坡和香港均极其注重发展高增值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业。高增值服务业的发展使得一些人可以获得丰厚的投资回报，加速了财富集中的速度。研究表明，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香港的收入分配因金融服务业的飞速发展而有所恶化。1981 年的基尼系数上升为 4.53。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也出现类似的情况，1984 年的基尼系数升至 4.74，使得这两个经济体收入分配情况水平倒退到它们在 60 年代中期之前的状态。[7]据此，很多学者认为，增长过程的性质发生变化，是香港、新加坡和台湾自 80 年代中期之后收入分配不公平扩大的主要原因；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而且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性质。[8]

表 1 是一段特定时期内有关台湾和韩国的收入分配国际性比较的有关数据，说明了亚洲“小虎”的收入分配要远远优于拉丁美洲国家，甚至优于美国。同时，也表明了亚洲“小虎”收入分配在其经济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过渡期中并未出现如库兹涅茨所述的恶化。以五等份比率显示的台湾的收入分配在 1965 年为 5.0，1980 年降至 4.17，说明台湾的收入分配状况有稳步的改善。虽然台湾的收入分配情况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也发生了逆转。到 1990 年，该比率已达 5.18，1991 年重又回落至 4.97。但是，与香港、新加坡一样，台湾收入分配的恶化也是由于增长过程本质的变化所造成的。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为了对付岛内工资的上涨，台湾将其大部分劳动密集型工业转移至中国南部。1985 年之后，就业人数而言，服务业已成为台湾岛内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房地产部门和股票市场的投机活动使台湾岛内的一部分人得以在很短的时期内暴富。

表 1 台湾与韩国的收入分配国际性比较

国别或地区	年份	最高收入阶层（20%）与最低收入阶层（20%）收入差距（以倍数计算）	基尼系数
台湾	1970	4.58	0.294
	1976	4.18	0.280
	1980	4.17	0.277
	1985	4.50	0.290
	1987	4.69	0.299
韩国	1970		0.332
	1976	7.95	0.362
	1980	7.95	0.390
	1986		0.336
墨西哥	1977	19.90	0.492
巴西	1972	33.0	0.565
	1976		0.590
日本	1979	4.31	0.270
美国	1980	5.00	0.329

资料来源：台湾：《个人收入分配概览》，1987 年版。转引自隅谷三喜男等《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就与问题——新兴工业化群体的典型分析》，第 363 页。

由于韩国政府对国内一小部分大企业集团的发展给予倾斜政策,20世纪70年代之后,又通过推行进口替代政策,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韩国的收入分配恶化,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1965-1970年间从0.344降至0.332。但是,由于韩国政府在整个70年代鼓励发展重工业,使得基尼系数回升至1982年的0.357。20世纪80年代之后,韩国政府开始调整对大企业集团经营重工业的优惠措施,其结果使得基尼系数有所改善,1986年为0.336,与70年代差不多。

亚洲“四小”经济增长性质的变化是使其收入分配处于动态变化的重要原因。但是,正如制度假设理论所提到的,在经济从不发达到发达的发展过程中以下诸多因素是促使亚洲“四小”的收入分配状况偏离了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假设。

第一,它们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初始条件较为有利。对台湾与韩国而言,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曾经进行过有效的土地改革。在美国影响下,它们在战后又进一步加强了土改。土改的成效加上农业部门的现代化发展,使得韩国与台湾在开始它们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之时,要比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拥有较为公平的资产分布。香港与新加坡作为城市经济体,从来不必去费心对付农村土地的不公平分布以及幅员辽阔、停滞的农业部门。因此,亚洲“四小”较为公平的资产分布,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初始条件,也是较为公平的收入分配的前提条件。

第二,教育是被公认为与亚洲“四小”较为公平的收入分配有着正面互动的联系效应。有关数据表明,亚洲“四小”政府都对教育部门进行了大量的投资。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的识字率已占人口总数的90%,中学的入学率为70%至80%。该比率与发达国家已经相差无几了。妇女群体接受教育面广是亚洲“四小”的一个显著特征,并与妇女加入劳动力队伍比率的增加相一致。很多以前失业,或在工薪很低部门工作的妇女因为接受了较好的教育,有可能找到支付较高薪水的工作。而妇女群体工薪的增加则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9]

第三,亚洲“四小”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都经历了生育率快速下降过程。从1965年至1973年,人口增长的年平均率香港为2%,新加坡为1.8%,韩国为2.2%,台湾为2.4%。1973至1985年台湾的人口增长率仅为1.7%,并呈持续下降趋势。[10]香港、新加坡和韩国人口的增长也与台湾一样,出现了大幅下降的趋势。据统计,从1980年至2000年,人口年增长率指标,香港降为1.2%,新加坡降为1%,韩国降为1.5%。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是影响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尤其在农村,人口增长愈快,收入分配便愈不公平。[11]

第四,亚洲“四小”的面向出口工业化发展战略包括了发展面向出口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妇女在这些部门的充分就业,有助于增加家庭收入。除韩国之外,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的工业发展是建立在中小企业的基础之上,从而避免了其他国家所出现的财富高度集中的现象。

由此可见,亚洲“四小”收入分配情况是与较为公平的资产分布、教育的发展、人口生育率低、经济增长过程的性质和适宜的工业政策密切相关,而并非如库兹涅茨理论所假设的取决于市场力量的作用。

三、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的收入分配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前，泰国与印尼的收入分配情况曾经程度不同地出现“库兹涅茨倒 U 形曲线”效应。以 20 世纪 70 年代为中界线，它们在早期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情况都出现了恶化。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至 80 年代初期，泰国和印尼的收入分配均得到程度不同的改善。然而，这种情况的发生并非如库兹涅茨所描述的那样，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由市场的力量所决定的，而是由泰国与印尼的收入分配机制以及政府所采取的形式各异的强干预政策所带来的后果。马来西亚的收入分配情况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前则呈现出与库兹涅茨“倒 U 型曲线”相反的现象。基尼系数在 1968 至 1973 年间下降，但接着便稳步上升。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由于受外部投资浪潮效应的影响，东盟三国的经济增长在 80 年代末至 90 中期经历了一个新的高涨期，然而，很多实证研究表明，收入分配情况在这段时期不同程度地恶化了。1997 年夏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这三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产生了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影响。由于遭受危机打击的主要是现代经济部门，因此，在金融危机期间，城市地区的收入分配不均衡，以及由此带来的贫困情况要比农村地区更为严重。由此可见，一国的收入分配情况不仅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而且还取决于一国经济增长过程的性质。不过，由于东盟三国国情不同，这三国的收入分配情况具有显著的差异性。

在泰国，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财富的分配也出现较为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尤其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之后，由于泰国的进口替代工业主要集中在曼谷与周边地区，使得首都城市地区与其他地区，以及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直至 90 年代之后才稍有改善。表 2 反映了 1975 至 1992 年泰国的不同阶层群体的收入分配情况。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泰国的收入分配情况趋于恶化。有关研究表明，以基尼系数反映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状况在 1992 年之后有所好转，从当年的 0.5313 降至 1994 年的 0.5179 和 1996 年的 0.5114。但是，这种趋势在 1998 年上半年发生了逆转，反映分配不公平的基尼系数升至 0.5136。[12]

表 2 1975 - 1992 年泰国各阶层群体的收入分配状况
(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各阶层群体的划分	1975	1981	1990	1992
10%人口的最低收入	-	-	-	2.5
20%人口的最低收入	6.1	5.4	4.1	5.6
20%人口的次低收入	9.7	9.1	7.4	8.7
20%人口的中等收入	13.9	13.4	11.6	13.0
20%人口的次高收入	21.0	20.6	19.7	20.0
20%人口的最高收入	49.3	51.5	57.3	52.7
10%人口的最高收入	-	-	-	37.1

资料来源：Bello, W., Shea, Cunningham & Li, Kheng Poh A Siamese Tragedy, Development & Disintegration in Modern Thailand, published by 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 1998:37, table 2.4.

马来西亚的收入分配情况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 70 年代重工业发展时期有所恶化。但是，马来西亚政府在 70 年代开始大力推行的“新经济政策”，以及之后发展面向出口工业的努力，抵消了工业化发展对收入分配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使收入分配情况在之后的较长时期内逐渐有所改善。世界银行的一些资深研究员认为，马来西亚的“分享增长”的收入分配机制具有其显著的特点。马来西亚国民阵线执政的联合政府在 1970 年开始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其实质是强化国家推动种族之间再分配的作用。“新经济政策”的战略目标是：（1）为全体马来西亚人民（不论其种族）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缓解直至消灭贫困；（2）加速重构马来西亚社会，纠正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减少，乃至最终消灭因经济作用而导致的种族差别。回顾 70 年代之后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到，在飞速的结构变动和经济扩展过程中，马来西亚政府一方面实现了上述目标，另一方面基本上保障了各种族之间的公平，并未使任何种族受到太大的损失，或有被剥夺的感觉。[13]实践证明，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在缓解城乡贫困方面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城乡各阶层的贫困率有了大幅下降。以 1970 年与 1987 年相比较，农村地区的贫困户比重从 58.7% 降至 1987 年的 17.3%，城市地区则从 21.3% 降至 8.1%。[14]

印尼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情况也趋于恶化，主要表现在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财富集中，分配不均；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是社会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引起印尼政府的重视。印尼前总统苏哈托提出了“经济民主”的口号，明确地表明了印尼“分享增长”的政策原则。苏哈托政府明确指出：“印尼人民奋斗的目标是在建国五项原则（即信仰神道、民族主义、民主、人道主义、社会公正）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与繁荣。为了这个崇高的目标，必须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均衡和国家稳定三项原则。任何一个方面受到干扰，如经济增长了，但没有实现社会均衡及嫉妒恶化，最后将导致社会动乱”。为了消除社会贫富差距，印尼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1）引导并激励外资与本国大资本投资于东部和落后地区，发展工业、矿业和木材工业；（2）政府拨出巨款，加强爪哇岛的向外移民工资，开发岛外的落后地区；（3）印尼政府要求大企业集团向合作社转让企业的股份，帮助中小企业发展生产；（4）增加对地方与农村建设的财政开支，以缩小城乡差别；（5）向人民提供廉价住宅等。印尼政府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尽管印尼是人均国民收入在东亚地区仍然是最低的，然而，收入分配的分布却比马来西亚、泰国要均衡得多。1996 年，印尼收入最低的 40% 人口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为 19.3%，收入最高的 20% 人口所占的比重为 44.9%。同年的基尼系数为 0.365。[15]印尼城乡贫困人数的比例和人数在 1970 年至 1996 年间骤然下降，城乡贫困人数的比例从 1970 年的 60% 降至 1996 年的 11.3%，全国的贫困人数则从同期占人口总数的 70% 降至 22.5%。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印尼 1998 年的 GNP 缩减了 13.5%，而危机的最终受害是普通百姓，尤其是居于社会底层的贫困群体。据印尼中央银行估计，1998 年，印尼农村地区低收入人群的

印尼政府在 1993 年公布的居民贫困线标准为每人每月收入为 24000 盾，约合 11 美元。

人均收入下降 44.1%，城市地区则下降了 54.1%，从而使印尼的贫困人数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从 1997 年的 11.3% 增至 1998 年的 39.1%。[16] 因此，印尼的收入分配状况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有所恶化。

四、菲律宾的收入分配

菲律宾的收入分配不平衡状况较为严重，这是由菲律宾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首先，战后所进行的多次失败或走样的土地改革，使得包括土地在内的财产所有权仍为少数人所占有，分布极端不公平。其次，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长期滞后，导致工业部门的就业机会稀缺。再次，人口增长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而经济却长期处于“增长——崩溃——再增长——再崩溃”反复恶性循环的周期之中，使生活在贫困线下的穷人所占比重居高不下。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菲律宾的收入分配情况曾有所改善。但是，当经济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进入较快增长时，收入分配状况明显恶化，基尼系数从 1994 年的 0.45 上升至 1997 年的 0.49。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库茨涅茨“倒 U 型曲线”效应在菲律宾的验证。只是这种效应在菲律宾经济中的显现要比东盟三国滞后约 20 年。

对表 3 的资料进行分析得知，菲律宾收入最低的 40% 的人口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 1994 年的 13.7% 降为 1997 年的 12.3%，而收入最高的 20% 的人口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则从同期的 51.9% 增至 55.8%。其间，唯有占人口 10% 的最高层收入者，对财富的占有比重一直呈上升势头。而其他占人口 90% 的各阶层群体，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均有所下降。换言之，仅占人口比重 10% 的富人的收入增长要比其他各阶层群体增长要快的多。

表 3 1985 至 1997 年菲律宾各阶层群体的收入分配与基尼系数

衡 量	1985 年	1991 年	1994 年	1997 年
将收入分配从最低至最高分成 10 份				
第一个 10%	2.0	1.8	1.9	1.7
第二个 10%	3.2	2.9	3.0	2.9
第三个 10%	4.1	3.8	3.9	3.4
第四个 10%	5.0	4.7	4.9	4.3
第一至第四个 10% 之总和	14.3	13.2	13.7	12.3
第五个 10%	6.0	5.7	6.0	5.3
第六个 10%	7.3	7.0	7.4	6.7
第七个 10%	8.9	8.8	9.1	8.6
第八个 10%	11.4	11.4	11.8	11.4
第九个 10%	15.7	16.1	16.4	16.1
第十个 10%	36.4	37.8	35.5	39.7
第九至第十个 10% 之总和	52.1	53.9	51.9	55.8
基尼系数	-	0.47	0.45	0.49

资料来源：菲律宾国家统计局。

由于菲律宾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和不振状态，人口增长率高，加上收入分配严重的不公平，贫困一直是菲律宾最大的社会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1997 年，菲律宾全国仍有 2730 万人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下，约占人口的 37.5%。其中，农村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占 51.2%，城市占 22.5%。[17]由此可见，农村的贫困状况相比于全国平均水平要严重的多。

参考资料：

- [1] Kuznets, 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 [J], March 14, 1955: 1~28.
- [2] Wright, C. L.,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Examining the Evidenc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J], Vol. 13, October, pp.51, 62, 63.
- [3] 参见于同申：发展经济学—新世纪经济发展的理论与政策[M].第 58 ~ 60 页，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2 月出版；Tan, G., *The End of the Asian Miracle? (Tracing Asi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M]. Times Academy Press, 1997: 187~194.
- [4] Rao, B., Income Distribution in East Asian Developing Countries, *Asia-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J]. Vol. 2 No. 1 march, 1988.
- [5] 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29~32.
- [6] Page, J., The East Asian Miracle: Building a Basis for Growth,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J]. Vol. 31 No.1, March, 1994:5.
- [7] Bowring, P., Crumbs for the Poor: Wage Earners Fall Behind in Wealth Distributi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 March 5, 1992:16~17; Rao, B., Income Distribution in Singapore: Trends and Issues,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J]. Vol. 35 No. 1, 1990:143~160.
- [8] Chen E.,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n Asia: Growth Experience and Prospects, in R A Scalapino, S. Sato and J. Wanandi (eds),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 Present and Future*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150~150.
- [9] Papanek, G., The New Asian Capitalism: An Economic Portrait, in Berger and Hsiao (eds),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M].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cations, 1988:70~72.
- [10]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4*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231.
- [11] Ahluwalia, M.,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Some Stylized Fac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 Vol. 66 No.2, 1976:132.
- [12] Pongsapich & Brimble, *Assessing the Social Impa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ailand* [R]. Paper submitted to Finalization Conference on Assessing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参考资料下转第 87 页)

菲律宾官方规定的贫困线标准是，每一人口的年收入为 8885 比索，六口之家月收入为 4442 比索（按 1987 年固定价格）。

中心对外交流的主要窗口，它的形象设计及其实施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了。可以说，形象设计观念的树立是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图书馆长远规划的转折点。中心图书馆的形象设计以 ICI 为观念更新的起点，现代图书馆的科学管理方法为参照，已有资源为基础，多项条件的逐步完善为保障。

参考文献：

- [1] 潘寅生主编. 图书馆管理工作[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 年。
- [2] 程亚男主编. 图书馆工作概论[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 年。
- [3] 王学熙主编. 图书馆业务研究与业务辅导[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年。
- [4] 沈迪飞主编. 图书馆信息技术工作[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年。
- [5] 常书智主编. 文献资源建设工作[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年。
- [6] 刘俊熙、樊松林、陈守福主编. 网络时代的图书情报工作[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 年。

[责任编辑：金 岩]

（上接第 24 页）

Financial Crisis in Selected Asian Developing Economies, 17-18 June 1999, ADB Auditorium.

- [13] Salleh, yeah, and Meyanat han *Growth, Equity,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Malaysia: The Role of the Public Sector, Lessons of East Asia* [R]. World Bank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D.C.1993.
- [14] 乔莫、戈梅兹：“多种族国家马来西亚的租金与发展”，青木昌彦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M].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8 版，第 414 页。
- [15] 世界银行：1999/2000 年世界发展报告[M].第 234 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年翻译出版。
- [16] Knowles, Pernia & Racelis, *Assessing the Social Impact of Fianacial Crisis in Asia: Integrative Report* [R].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Resource Center, ADB. 1999:35.
- [17] 世界银行：1999/2000 年世界发展报告[M]. 第 233 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年翻译出版。

[责任编辑：王 勤]